

墨香财经学术文库

“十二五”辽宁省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nvestment Rate Fluctuations in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 Theories

中国投资率波动研究

基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的视角

李东阳 齐鹰飞 周学仁 蔡甜甜 ◎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0140342/2

墨香财经学术文库

F832.48

118

“十二五”辽宁省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



Investment Rate Fluctuations in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 Theories

中国投资率波动研究

基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的视角

李东阳 齐鹰飞 周学仁 蔡甜甜 ◎ 著



北航

C1722538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连

F832.48
118

© 李东阳等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投资率波动研究：基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的视角 / 李东阳等著.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12

(墨香财经学术文库)

ISBN 978-7-5654-1398-8

I. 中… II. 李… III. 投资率—经济波动—研究—中国 IV. F83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9039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教学支持：(0411) 84710309

营 销 部：(0411) 84710711

总 编 室：(0411) 84710523

网 址：<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dufep@dufe.edu.cn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字数：143 千字 印张：10 插页：1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孙晓梅 张晓鹏 田玉海

责任校对：毛 杰 刘咏宁

郭海雷 吴 焕

封面设计：冀贵收

版式设计：钟福建

定价：30.00 元

前 言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特征进一步强化。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准确监测和预测经济运行、防止出现大的起伏波动是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艰巨任务，也对国内的相关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 2008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实体经济的严重影响，使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再次认识到改进和完善经济监测预警系统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投资领域，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需要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投资规模持续过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加剧了内需不足和出口压力、为维持高投资率所需的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政府和国企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加剧了地方债务风险和金融系统风险。可见，对中国投资领域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科学确定投资率及其合理区间，已显得极为迫切。

本人有幸参与了高铁梅教授主持的 201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运行动态监测分析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010）。承蒙高铁梅教授抬爱，邀我担任该项目子课题“‘十

二五’时期投资规模局限与结构调整动态监测分析”的负责人，其他三位作者均为子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本书即该项目子课题的主要阶段性成果。在研究过程中，中国经济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进入“十二五”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基调由“保增长”转向“稳增长、调结构”，经济增长速度也由9%以上的高速过渡到7%~8%的中高速。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战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中国投资率受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程度将逐渐减弱，受市场机制调节的影响程度将逐渐增强，投资率终将由目前超高的水平回归到合理和适度的区间。基于此判断，本书对项目计划研究的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增强了对中国投资率的相关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而不仅限于投资率的监测与预测分析，这将使本书的研究内容更适合中国当前及今后的经济形势，并为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把握中国投资率的未来趋势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因此，本书基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视角，在回顾分析中国投资率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对中国投资率的决定因素、合理区间、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以及投资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调控中国投资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本书的分工如下：李东阳教授制定了总体研究框架，撰写了第1章和第4章，并对全书进行了总纂；齐鹰飞教授撰写了第2章、第5章第一节和第6章，并对全书的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进行了系统设计；周学仁副研究员撰写了第3章和第5章第二节，并对研究工作的推进和本书的撰写进行了组织与协调；博士研究生蔡甜甜撰写了第7章，参与撰写了第4章和第5章第二节，并具体执行了多数实证检验所需的计量软件与统计软件的操作过程。另外，鲍洋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生王轶、郭龙、孙慧霞、赵旭霞、苏文龙、李艳参与了本书的部分内容撰写、文献与数据的收集整理、相关的实证分析与统计分析等。所有作者和参与人员为顺利完成本书的撰写均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和智慧，在此向各位的辛苦付出与努力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向为本书研究和撰写过程提供资助与指导的高铁梅教授，为本书出版提供支持与帮助的田世忠社长、高鹏主任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难免有错漏之处，我们真诚欢迎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提供宝贵建议。

李东阳
2013 年 11 月于大连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 1

- 1.1 研究背景 / 1
- 1.2 研究意义 / 12
- 1.3 研究方法 / 13
- 1.4 研究框架 / 14

第 2 章 投资与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研究综述 / 16

- 2.1 投资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 16
- 2.2 投资与经济周期波动研究综述 / 26
- 2.3 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率研究综述 / 44

第 3 章 中国投资率演变历程与国际比较 / 48

- 3.1 中国投资率的演变历程 / 48
- 3.2 中国投资率的国际比较 / 62

第 4 章 中国投资率的决定因素 / 82

- 4.1 稳态投资率决定方程 / 84

- 4.2 实证模型、变量及数据 / 86
- 4.3 基于 ARDL 模型的协整检验与实证结果 / 90
- 4.4 结论与政策建议 / 98

第 5 章 中国投资率的合理区间 / 100

- 5.1 投资效率约束下的中国合理投资率 / 100
- 5.2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的中国合理投资率 / 106

第 6 章 中国投资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 / 111

- 6.1 实证模型和数据 / 112
- 6.2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114
- 6.3 结论与政策建议 / 120

第 7 章 中国投资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 / 122

- 7.1 宏观经济模型研究综述 / 122
- 7.2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模型 / 125
- 7.3 中国投资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模拟分析 / 130
- 7.4 调控中国投资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建议 / 133

参考文献 / 135

索引 / 151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世界经济正处于危机后调整期

(1) 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呼唤制造业回归

20 世纪末期和 21 世纪初期,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和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发达国家进入了“去工业化”阶段,把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实体制造业的转移使得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2008 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并迅速波及全球,2012 年欧洲爆发了欧债危机。为了应对危机、提高就业率,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战略。

奥巴马政府在 2009 年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发展制造业,促进就业和重振实体经济。为此,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新型高科技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回流的优惠政策。大型跨国企业减少了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仅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跨国企业回流,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出现转移现象。如 2012 年 7 月阿迪

达斯关闭了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工厂。^① 欧盟力图通过发展以“绿色经济”和“环保型经济”为主的新型技术产业来促进经济复苏。2009年4月,欧盟制定了一项中期规划,将在2009—2013年投资1 050亿欧元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日本注重继续加强节能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2009年3月,日本政府出台了一项为期3年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计划。^②

发达国家对制造业回归的呼唤和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会使一些跨国公司的投资回流,同时本可能投资于国外的资金也会倾向于投资本国支持的产业。在这种趋势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规模可能会有所下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趋势。

(2) 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受到了严重冲击。为降低本国失业率、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贸易壁垒层出不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仍被频繁使用。据商务部统计,至2013年,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一些发达国家也出现了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倾向,限制其对本国基础设施、能源、金融、高新技术等领域的投资。例如,2011年,英国拒绝了华为在英国的投资;2012年,美国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中国的华为、中兴两个电信企业进行审查,并多次否决它们的并购项目。

随着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对外资项目的要求和审核也日趋严格,中国对外投资的难度加大。国际安全环境复杂,对外投资合作的境外安全风险加剧,使得中国企业的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① 孟祺. 美国再工业化的政策措施及对中国的启示 [J]. 经济体制改革, 2012 (6): 160-164.

^② 宋宗宏. 发达国家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启示 [J]. 产业经济, 2011 (2): 31-36.

(3) 全球债务风险加剧

2009 年以来, 欧洲部分国家相继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主要是因为本国政府的债务负担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而引起的违约风险。它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和深化。早在 2008 年北欧的冰岛主权债务问题就浮出水面, 但因救助及时, 并未造成较大的全球金融动荡。2009 年 12 月,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凸显, 2010 年 3 月蔓延到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等国, 并有波及整个欧洲的趋势, 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连连下调债务国的信用评级, 投资者对欧元经济区前景悲观。

金融危机后, 美国国债持续突破债务上限。2013 年, 尽管美国政府最后达成了解决“财政悬崖”的妥协方案, 但“财政悬崖”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仍是不确定因素, 随时都有可能复发。美国的第三轮量化宽松 (QE3) 货币政策迟早要退出。一旦 QE3 退出, 美国的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紧缩风险。

在欧元区深陷债务泥淖、美国面临“财政悬崖”的时候, 日本政府的债务困局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2 年 9 月日本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国债余额已经超过了 GDP 的 200%, 这个比例已经高于身处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日本首相安倍上台后, 依靠日元贬值和宽松财政政策刺激了经济的短期增长, 但无法解决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长期看会加剧日本债务负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预测, 到 2015 年, 日本债务累计额将相当于 GDP 的 2.5 倍。虽然持有日本国债的多是本国的金融机构, 不会担心被国外投资者抛弃, 但巨大的偿债压力始终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就中国而言, 地方债的状况也不容乐观。2008 年金融危机后, 中国出台了 4 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各地政府也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刺激当地经济, 发行地方债成了一个重要的融资方式。审计署 2013 年 6 月公布的《36 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 36 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比 2010 年增长 12.94%。借此, 国外评级机构认为, 中国地方债规模应在 13 万亿元左右。地方债务负担重, 偿债压力大, 债务风险加剧, 使得中国依靠地方政府强推投资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1.1.2 中国高投资率难以为继

(1) 高投资率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

在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依靠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大规模的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绩，但也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衡。近几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充分发挥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投资过度已经导致经济结构性失衡极为严重。

从投资、消费、净出口构成的“三驾马车”来看，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占比较小，在 GDP 一定的情况下，投资与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用于投资的部分多了，用于消费的部分就少了。长期来看，投资与消费应当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关系，任何一方持续偏高或偏低都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的投资率持续高位运行，2003 年以后，中国资本形成率一直在 40% 以上，2009 年之后更是达到了 48% 以上。相比之下，消费率却在呈下降趋势，1978 年中国消费率为 62.1%，20 世纪 80 年代基本上都在 60% 以上，但 90 年代后逐年下降，2012 年中国消费率已经降至 49.5%。投资率持续增高与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后果是，高投资率导致的高产出缺乏消费的支持，产能过剩，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引起经济结构失衡，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2) 高投资率造成投资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

依靠高投资率驱动经济的发展模式面临着边际产出效率递减和边际投入成本上升的问题，即过高的投资率必然会导致投资效率降低和资本利用率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2 年发布的四号文件显示，中国的平均资本利用率从 2007 年底的 80% 下降到了 2011 年的 60%，意味着经济运行效率降低。长期以来，由于一些政策性原因，中国在传统行业投资偏多，新兴产业、教育、医疗等行业的投资偏少，造成部分行业供给大于需求，产能过剩，部分行业需求旺盛，产品价格上升。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使得回报率低下，企业家只能通过更多资金的注入以期望获得资金周转，但这却会引起新一轮投资率的上涨，进入恶性循环。

近年来，高投资率的负效应日渐凸显，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国有工业部门尤其是国有制造业部门的高投资

率，在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自身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工信部2013年披露的数据显示，2012年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1.9%、73.7%、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同时，上述行业还有大量的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矛盾呈日益加剧之势。产能过剩也导致这些行业面临亏损，效益下滑。2012年，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行业企业亏损面分别为28.2%、34.9%、27.8%、35.7%；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分别为1.04%、-0.29%、6.63%、0.14%，同比分别降低1.37、3.64、4.68、3.82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模式的低效率是造成当前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在钢铁领域，由于国内冶炼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限制，新增的投资实际上集中在中低端领域，使得市场中资源分布不均，低端同质品的供需矛盾尖锐，而高端产品却缺乏足够的规模从而失去市场话语权。即便在光伏产业这样的新兴行业，由于国家政策的扶持，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几乎都将其列为优先发展产业。这种一哄而上式的大规模投资，不可避免地使光伏产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虽然中国对光伏产业实施了产能削减措施，但截至2013年上半年，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状况仍非常严峻。产能过剩必然导致内需不足，大量的光伏产品需要通过出口来消化。但出口量过大，产品价格低，又使光伏产业出口频频遭受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

(3) 高投资率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消耗，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的深化，资源供给压力逐渐凸显，持续的高投资率所带来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加剧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

中国的耕地面积本身不足，近年来投资的高速增长以及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导致建设用地面积陡然上升，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增长以及城镇化的加速，耕地面积越来越少，紧逼18亿亩耕地面积红线。能源供应的形势也十分严峻，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钢铁、铝、水泥

等高能耗行业)的过快增长,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率大幅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1—2006年间中国年均能源消费增长率达到10.06%,2007年以后虽然有所下降,但消耗量仍然持续上涨;2009—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从30.66亿吨标煤增长到34.8亿吨标煤,年均增长2.1亿吨标煤,2012年达到了36.2亿吨标煤,离2015年的“限值”40亿吨标煤,仅有3.8亿吨空间。

粗放型经济增长下高投资率带来的高消耗同时会加剧环境污染。近年来,中国大气污染严重,中东部地区不断出现雾霾天气,给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居民健康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此外,饮水安全和土壤污染等问题也集中暴露。长期以来,在高投资率支持下的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高能耗、高排放、重污染、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以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的持续强化,再加上环境保护监督执法不力,足以让诸多环境污染问题集中爆发。因此,30多年不惜以严重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型。

(4) 高投资率使地方债风险加剧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权比例缩小,事权比例扩大;2002年以来,地方政府承担大约70%的事权,却只有45%的财权,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匹配造成地方财政投资只能依靠举债融资。^①地方政府主要以所拥有的土地作为担保进行融资,通过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等发行地方债券,将募集得到的资金用来支付征地补偿,然后通过土地出让金或建成基础设施后征收的税收来还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地方建设投资需求快速增长。为刺激经济快速增长,提高政绩,地方政府利用政府信用不断举债,扩大投资规模,以期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和更高的GDP增长率。持续较高的投资率使得地方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地方债连年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随之纷纷推出了地下轨道交通系统、城市轻轨、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平台成为地方政府为建设这些项目筹集资金的重要

^① 沈洪涛.我国地方债发展现状及其分析[J].金融博览,2013(6):9-10.

渠道。2009年初,央行与银监会联合发文,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组建投资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一时间,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飞速发展,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审查也偏松,加剧了地方债务飞速增长。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截至2012年年末,中央和地方的债务总额为15万亿~18万亿元,约占GDP的29%~35%。

多年来居高不下的投资率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越来越重,在还债压力增大的同时又面临经济下行风险,未建设完的项目或者在计划内的项目依然需要资金注入,迫使政府必须继续发债,并期待项目完工后获得财政收入以还债,而这又必将引起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因此,依靠高投资率发展经济,虽然短时期内会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但也会使地方债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加剧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1.1.3 中国经济降速与打造经济升级版

李克强总理上任之后,对中国经济总体的发展模式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同时,在多重因素的约束下,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降至7.5%左右的水平。在这种降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着力进行结构调整,并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因此,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将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搞短期刺激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政府从2008年年末开始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在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大量信贷支持下,中国率先走出危机阴霾,经济迅速复苏,但随之带来的通货膨胀、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也危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2012年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为8.1%、7.6%、7.4%、7.9%,全年GDP平均增长率约为7.8%,是1999年以来的增速最低值;2013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7.7%,第二季度为7.5%,第三季度为7.8%。与前些年9%~10%的经济增速相比,中国已经进入到了7%~8%的经济降速发展期。

在降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刻不容缓。一方面不能过分追求 GDP 增长率,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威胁,要保证中国经济在合理区间内实现稳定增长。稳定增长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前提,没有稳定增长,调结构就没有基础和条件。李克强总理认为,经济应该在平稳的合理区间内运行,这个区间的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是防范通货膨胀。201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全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为 GDP 增长率不低于 7.5%,CPI 不高于 3.5%。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原有的土地红利、人口红利等优势开始减弱,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先升后降的 GDP 增长率已经验证了靠短期投资刺激经济仅仅是给疲软的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在不突破经济合理调控区间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转变增长方式,促进改革,利用“改革红利”来促进其新一轮的稳定发展。

(2) 调整经济结构,加速产业升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结构得到了不断的调整和优化,但其不合理的矛盾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城乡和区域结构失衡、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等方面。

从需求结构看,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不够协调,主要表现为对外需依赖大,内部需求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同时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从城乡和区域结构看,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落后、城乡和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从要素投入结构看,资源消耗过大,环境压力加大,资源和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从产业结构看,三次产业发展不平衡,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①

要调整经济结构,加速产业升级,首先要优化投资结构,调整投资的方向、方式和机制。2013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

^① 李克强. 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 [J]. 求是, 2010 (11): 3-15.

当前的经济形势，再次提出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信息产业发展，大力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推动新兴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国家从战略上为投资方向做了部署；从投资方式的转变看，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早在2010年5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共计36条，划定了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金融保险、文教卫生和公共服务等五大民资准入领域。此后，各省市相继出台了实施细则，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各个行业，盘活民间资本。李克强总理认为，增加投资重在加强薄弱环节的建设，把资金投在一些薄弱的基础设施方面不会造成重复投资，不会形成过剩产能，而且有利于调整结构。城市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节能环保设施的建设，包括地下管网、污水处理、垃圾焚烧等，是可以引入民间资本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方面可以拓展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能缓解政府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压力。因此，从今后一段时期来看，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趋势会加快，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界限逐渐弱化，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机制会逐渐向市场主导的投资机制转变。

（3）促进改革创新，理顺要素配置方式

新一届政府施政以来，将“改革”列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在行政管理、财税、金融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这些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理顺要素的配置方式，强化市场配置各种要素的作用，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1/3以上。会后，以“简政放权”为切入点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措施逐步推出。4月24日，国务院第一批取消和下放了71项行政审批事项；5月6日，再次取消和下放61项行政审批事项；6月19日，第三批取消和下放32项行政审批事项；7月22日，继续取消和下放了50项行政审批事项。这些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涉及石油天然气、民用机场、轨道交通、移动通讯、矿产资源开发等一系列原来受管制或垄断的投资领域，还涉及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